

# 纸上烟云，江南旧梦

——读孙宽画作

文/张焱

思不群

迈高蹈，怡然自得，在城市山林间自由生息。当人世的目光聚焦它时，它如一位美丽的舞女，单腿独立在桥头，张开的双腿，仿佛那遗世而独立的美神的化身。“落花人独立”，尘世的目光被美好惊悚停滞；“微雨燕双飞”，知命的玄鸟默然停驻在粉黛窗瓦的内庭院院。自由独立的精灵，抛却了世俗诱惑，抛却了爱欲与纠缠，抛却了三生三世，甚至抛却了身体与意念，在纵浪大化中，不喜不悲，不忧不惧，他在沧浪亭的后花园小径上吟哦之后，步伐突然加快，从月洞门一踱身，瞬间遁入近水远山的大平静、大自在。

大哲人黑格尔说：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在孙宽这里，园林是审美理想的感性显现。而且这种显现纯粹是精神的静观，是与物混化，身心俱融。繁华世界，喧鬧器攘，精神之梦无从栖息。而在这墨色围起来的精神之境中，独有一真淳之世界。孙宽画过很多园林，有过去的园林，现在的园林，也有记忆中的园林，想象中的园林，然统而言之，他画的其实是一座园林，是园林本身，是元园林，是承载着他的江南旧梦的艺术精神的独立显现。这种显现，一方面是发散，是发抒，静以观物，澄以敬心。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筛选与寻找，期待着在卵石的花步小筑上，不时走来三两知音，可以携手赋诗，月下饮酒，花间醉眠，琴上听声，一了生之烦恼。刘若愚先生说“中国诗歌里没有时态，这使得它往往带有一种无时不在、无处不存的性质。”其实，中国画也一样，它们总有办法让羲皇的车轮为艺术的线条所羁缚，让时间的金箭停滞。即使如《一池秋水总宜诗》、《春水长》这样的作品，它既是季节的，又是超季节的，既是此在的，又是彼岸的，它呈现一个时间，又包含一切时间。当我们化入那张纸上的笔墨烟云中，时间的标识就会被忽略，“坐久落花多”，在物我相对

之中，而沉浸入那萧散、澄明之境中，生与死、过去与未来、愁与怨，它们的边界线上都在此消彼、模糊。

艺术是生命的自由呼吸。当生命脱下衣袍和铠甲，真切地意识到它自身，意识到它必须在自己的身体上呼吸时，艺术就从主体的影子中站立而起，并走出来，来到阳光下。宗白华先生说：“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板结的土壤松动了，精神的灵气随之逸出。无独有偶，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他的名作《悲剧心理学》中曾说过一个故事：伟大的波斯王泽克西斯在看到自己统率的浩浩荡荡的大军向希腊进攻时，曾潸然泪下，向自己的叔父说：“当我想到人生的短暂，想到再过一百年后，这支浩荡的大军中没有一个还能活在世间，便感到一阵突然的悲哀。”生与死的局限是根本的局限，死亡凌驾于生命之上，不时显露出它狰狞的面孔。而艺术则是一个最近的隧道，这隧道不是遁逃，而是一种超越，一种无限，是精神向自由的敞开，御风而行，是拔地而起后四方自由的观照。作为“有限对无限的乡愁”（约瑟夫·布罗茨基《哀乐的缪斯》），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精神的慰藉。艺术是一种置换，以一种伟大的自由精神，将人从庸常生活中超拔出来，置换到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超越生与死的美感观照之中，并在此一观照中导向内心的平静，我们借由艺术的通道遁入永恒。

孙宽出生于书画世家，自小耳濡目染，墨香浸润，自小种下了艺术之根。当然，把眼光放宽一点看就会发现，他的传承源流更其遥远，那是自沈周以来吴门烟水的荏苒流淌。“人家尽枕河”的源流

之水润泽无声，轻轻敲击着墙根桥头的秋思与凝望，他一定是在儿时之梦中就敏感的把捉到了人生与艺术的真如之思。他擅长构思，通过不同的构图方式来表达内心的语言。有时他会忍不住心底的偏爱，通过单点透视将园林的某一角单独突显出来，如《秋寂寂》，如《云淡风轻》，如《水将天一色》。一湾浅水施怀抱，两境梦幻心中寻，他是把一个最美的梦放在梦境里，在双重的怀想与回忆中朝着终极之境遨游。有时他通过对比和放大来一泻胸臆，如《江南旧梦》里近景是空空的亭子和立于小桥之上的白鹤，而远景则是一片黯淡的山峦隐于天际，一种疏朗、淡泊之情跃然纸上。很少谈到孙宽关于自己创作的问题，他似乎并不太善于表达，而偏好用精细细腻的笔触来表达内心的丰富。画石头，他并不一味地堆叠情感的块垒，有时是如风吹过，那些石头仿佛风的雕塑，是他用锋利的艺术之刃切下的风的剖面，整齐发白，在枝柯繁花之间，挣扎欲起，显露着峥嵘；有时它们突然获得了金剛之身，在《石不语》《石头记》系列中，那种尖锐、硬朗，像被突然贯注了勇猛精进意志；有时它们春思萌发，纏绵温柔，如在《涉园》里，浑身沾染了蓊郁、勃发的情思，射出那握笔之手后面丰富而多感的内心。

据说李可染先生曾有一枚印章，叫做“废画三千”，意思是不不要因为怕画坏就墨守成规，要突破创新，同时也是表明一种老老实实的创作态度，把整个生命力投进去，如“狮之搏象”，全力以赴。同样，孙宽在他的园林画的练习与创作上也是勤勉有加，临习不辍，几十年“搜尽奇峰打草稿”，念兹在兹，心无旁骛，佳作迭出。因了孙宽的这一方云蒸霞蔚的纸上烟云，我们在欣赏、感叹之余，也终得一慰心底的江南旧梦。在我们低回、叹息间，那烟云已氤氲得更其浑厚了……

## 诗二首

<p>晨 曦</p>	<p>盆栽蕃茄</p>
<p>是谁将黑夜捅破一道口子 玫瑰色的天光涌进来 仿佛再也堵也不住了</p>	<p>种在门前庭院里 从一朵小黄花开始 招引得蜂蝶频来造访</p>
<p>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漩涡 山川、河流、树木旋转着 中心是我美丽的家园</p>	<p>每日浇水、施肥、搭架 精心呵护打理 小小的果实在枝头 一点点膨大</p>
<p>万物都在等待 那个辉煌的时刻来临 我们庆幸自己打小 生长在祖国和平的怀抱里</p>	<p>清晨的乌鸦将我唤醒 便早早守在一旁 期望见证生活中每一处细微变化 不愿错过它们生命里所有重要时刻</p>
<p>父亲踏着朝阳走向田埂 在沟渠上游扒开一道缺口 欢快的水流便哗啦啦起 满田稻穗摇曳着金色晨曦</p>	<p>正午的阳光下 轻轻抚摸着 仿佛长大的女儿 一张张饱满的面颊 渐渐泛起羞涩红晕</p>



**雷池** 手丰收图  
吴成铭 摄

样，元末明初，一批又一批的古堡江人被迫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生存，铸造全新的故乡。

### 2、水乡泽国·围垦·主动选择

长江流经望江县域57公里。按现在江堤计，上起周家湾，下抵漳湖闸，加上东隔堤和皖河管理段，全长72公里。濒临长江的望江县地理拥有的三个基本特征，决定了雷池儿女唯有拓荒才能求生存发展。

**特征一** 水域宽阔，属“水乡泽国”。东晋庾亮《报温峤书》云：“吾忧西陲过于历阳，足下无过雷池一步也”。古雷水自湖北黄梅东流，经安徽宿松至望江县东南积而为池，称为雷池。之后自此以下东流入江。南朝（宋）文学家鲍照在《登大雷岸与妹书》中描述：“南则积山万仞，争气负高”；“东则砥原远隰，亡端靡际”；“北则陂池潜演，湖脉通连”；“西则回江水指，长波天台”。除“积山”指的是江南远山外，余者证明了“大雷岸”四围都为水所环绕。

明朝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望江县令罗希益为第三届县志写的序文中说：“望之为邑也，面江枕山，诸山奔腾蜿蜒，势若饮江，洪涛素练，天堑横绝，畴不号称奇观”。康熙五十四年（1715），主编望江第六届县志的沈镐先生在他的《雷水论》中说：“黄之诸泽，宿之众湖皆雷水所为也，而入成巨浸……望之四泽，可统名之曰雷水，而又漫，而与皖水相通，由炼坂趋皖口同为张港以入江，此雷水始终分合之大概也”。由此可见，古时江堤未兴，沿江一带沙洲尚未连片，泊湖与武昌湖相通，夏秋水涨，江水上涨，望江的大地只有两条龙脊，其他都是水。这也正如清人沈镐先生在他的《形胜论》文中描述的那样：“然二茗自分两支，一支从大茗之颠南下为分亩岭，穿石灰山，走长岭，一折而为祈雨山，再折而为石牛山，又折则为七里岗、五里墩而作县，其左界则为武昌湖之水，右界则泊湖之水也；其一支从小茗山之颠，北下而走大境作鹿磨山，折转陶山东出，又北折横开中起入望境，下平岗东走而心赛口，其左界则武昌河之水，右界则武昌湖之水也”。

**特征二** 水旱灾害频繁。古时望江对长江敞开着大门，让江水直进直出；又对后山的洪水敞开着后门，让其流失泛滥。故灾害多之，就可以想象了。明朝万历年间县令罗希益有过一段分析过望江旱涝灾害频繁和它的基本原因的论述：“然谷水之出也，无宽塘大陂以储之，稍一早不得享水之利；江水之溢也，无高堤曲防以障之，稍一涝不免受水之害，物力之絀，端坐此矣”。据乾隆县志对清朝顺治以后的“灾异逐年记载，从顺治三年（1646）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这121年之间，发生大小水灾24次，平均五年一次，发生旱灾9次，平均十三年一次。其实其中的三年旱灾害同时发生有2次：“顺治三年丙戌大旱，八年辛卯夏四月初七日大雷雨，茗山及横山俱起蜚蛟，千亩田舍漂没”；康熙年间，“九年庚戌五月大雨伤禾，积40

余日。冬十一月大雪，至十二月尤甚，城中深数尺，四乡庐舍被压坏，贫者不能出户，冻饿死者甚众……冰上牛马通行”。少有的康熙五十年至五十三年连续4年“大水又大旱”。道光二十八年到三十年（1848—1850）又连续三年大水灾。

史料表明，望江历史上水旱灾害是水灾为重、多为，而且是江水为害最多。现在全县各地还残存着当年江水为害的痕迹。如赛口汪洋庙一带，武昌湖四周的象嘴、郭河嘴、汪公坟一带，所见到的高有十几公尺甚至几十公尺赤壁悬崖，陡坡陡坎，都是当年江湖相通，夏秋之间，经常巨浪滔天，冲击山岗岭脚留下來的历史见证。

**特征三** 大面积的淤积沙洲，形成荒地。望江历史上既称泽国，不仅灾害频繁，土地面积也很少。清代安庆府所属怀、桐、潜、太、宿、望六县之中，望江居其末，有“弹丸之邑”之称。据乾隆县志记载：“明嘉靖元年（1522）官民田地塘亩两千六百六十九顷三亩一分（古制一顷为一百亩）；“乾隆三十三年（1768）各项钱粮全科则印稿载原额田两千六百七十四亩六亩五分”。上述数字表明，自明朝中叶到清朝盛世乾隆这240余年间，全县的土地面积都在26万7千亩左右，变化程度很小。土地面积虽小，但沿江、沿湖水域宽广，水域中大面积的沙洲和湖滩逐年形成。这是长江和华阳、皖河两大河流捆载上游大量流沙沉积的巨大作用。

清人沈镐先生在他的《雷沙论》一文中说：“外循江，内循水，跨陷入望境为杨湾，东北过吉水沟，又东北过雷港，又北路潜，又北路新沟及出望境而趋皖水，尽于郡城（指安庆，笔者注）之西岸，始终三而余里，虽所异名，皆雷沙也”。可见在270多年前，从望望江交界一直到安庆的西门外，大面积的沙洲就已露端倪。

沙洲形成之后，如同目前的江心洲、玉带洲一样，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芦苇杂草丛生、兔免出没之地。人们为了利用了它，经过简单的培植，成为收入相当可观的芦苇场或湖草场。这些柴草场在清代有国有的、有姓氏公堂所有的，也有地主或农民个体所有的。而且这些柴草场和田地丁口一样，向国库交钱粮税。据乾隆县志记载：芦课银二千六百五十六点九两。到民国年间就更多了，如民国九年因灾呈准缓征望江粮银元一万二千三百八十七元中，芦课即占三千八百六十九元。许多湖草场，直到1959年冬大开荒之前仍然存在，如泊湖的“八百吊”、“八两缺”、“三段”、“四段”等都是因划分柴草场而得名的；皖河水系的“廖家大场”和大湾一带，也有大片的芦苇湖草场。昔日，每年春秋两季打湖草和砍芦苇季节，这些地方都是日有千人劳作，夜有万盏明灯，肩挑车拉，川流不息，热闹非常。

面对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作为移民及其后代，望江人始终积极应对，主动作为，以“围垦”的方式开创出全新的天地。（待续）

## 望江县围垦史探源（一）

张焱

权。元朝是以蒙古族为主体的蒙汉各民族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阶段压迫、民族压迫及政治腐败与落后的生产方式，使之成为一个野蛮、落后的朝代。到了元中后期时，突出地表现在土地占有关系上的严重贫富不均，广大农民因丧失土地沦为“流民”的生活，正如张养浩的长诗《哀流民操》所说：“哀哉流民！为鬼非鬼，为人非人。哀哉流民！建树食其皮，掘草食其根。哀哉流民！死者已满路，生者与鬼邻……”。

在长达十六年的战争中，朱元璋先后灭了张士诚、方国珍、陈友谅等起义军势力。1367年，朱元璋灭东吴后进军中原，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上定京都，结束了元末群雄混战的混乱局面，于1368年建立了大明王朝。朱元璋接手过来的是一个烂摊子，战乱后给社会带来的现状是社会动荡不安，到处是满目疮痍，残垣断壁，遍地哀鸿，到处积骸成丘居民稀少，民不聊生。

出身贫贱的朱元璋，深深地了解农民被战乱蹂躏的苦难。如何巩固取得的政权和经济基础，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安妥社会，成了朱元璋的当务之急。朱元璋说：“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洪武三年，时任郑州知府的苏琦给朱元璋奏言“时宜三事”。其一为屯田积粟，以示长久之规；其二选重臣驻边镇，统辖诸蕃；其三垦田以实中原。奏言中明确指出：“自辛卯河南兵起，天下蹙然，兼之元政衰微，将帅凌暴，十年之间，耕桑之业，变为草莽。方今命将出师廓清天下，若夫设法，以实中原，患日久困用虚弱。为今之计，莫若计复业之民垦田外，其余荒芜土田、宜责之守令召诱移未八籍之民。”随后，户部郎中刘九皋、国子监生纳等人也奏言朱元璋：“古者狭乡之民迁于宽乡，盖地利不失利，民有恒业，……宜令分了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因此而成了明代移民集结地。”朱元璋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移民屯田，奖励开垦的战略决策如是北方“山东地广，民不必迁，山西西人众，宜如其言。”“南方则江西、湖广、湖广坝四川。”官方按“四口留一、六口留二、八口留三”的办法，拉开了明初大移民的序幕。山西洪洞大槐树和江西饶州瓦屑坝，因而成了明代大移民集结地。

（二）作为移民聚散地的瓦屑坝 瓦屑坝本是鄱阳湖畔的一个古老渡口，是明初移民的集散中心，政府官兵将被安排移民的对象聚集到瓦屑坝，然后上船遣送到目的地。瓦屑坝铭记了大移民的历史，历史为何选择这么一个个鄱阳湖畔的僻静的小村，作为移民聚散地？其一，饶州是江南富饶之地，这里人口稠密、

生产先进、农业发达，多位史学家说到瓦屑坝成为移民聚散地时，都认为这里因免于战乱而人口稠密。元末明初时，长江以北战火纷飞，各地出现土地荒芜和骸成丘，居民稀少时，而饶州“因为当地人吴宏、于光组织民众保土安民，所以人口没有大的损失。”从而使饶州各县成为宽乡。其二，鄱阳是当年饶州府治地。移民是朱元璋的重大决策，移民是政府行为，必须由官府办理。鄱阳是饶州府政治中心，政府的行政命令，必须通过府再到县，抓住了府、县自然办事。如果各县自行办理移民，不利于组织管理，当年饶州府管辖鄱阳、余干、万年、浮梁等七县属江浙行省，选择府之治所鄱阳为移民聚散地，是理所当然的事。再从鄱阳地理位置看，鄱阳面濒鄱阳湖，北望长江，南接乐安，信河诸水，沿水路上下可与余干、乐平、鹰潭、南昌及湖北、安徽州县甚相通。古鄱阳是饶州的水运枢纽，周边县的移民均能乘船直至府治地鄱阳集中。移民在瓦屑坝上船后，即可通过四通八达的水路送出鄱阳湖，经长江到达湖北、安徽、湖南诸州县。其三，鄱阳县莲湖乡位于县城城西十余里的鄱阳湖区，是个四面环水的孤岛，而瓦屑坝地形又成半岛形状，饶州府各县移民到达瓦屑坝集中，在这个半岛状的瓦屑坝，既能防止移民逃遁，又便于府官司员来往县城，加强管理及办证迁移。移民们从瓦屑坝乘船，过鄱阳湖到达湖口，然后顺长江而下，到达安徽各府县，逆长江而上，可到达湖北各府县，瓦屑坝凭着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江南移民聚散地是可以理解的。

（三）包括望江县在内的安庆府成为移民接收重地 江淮大地处于中国南北相交之地，在分裂时期往往沦为战场。1127年金灭北宋后，江淮之间既是金军南侵的必经之地，又是靠近宋金对峙的前沿，原有人口或随南迁洪流而去，或在战乱中死亡，留下的人数有限，新迁入的更少。安庆府所属的淮南西路，在整个南宋都是人口最稀少的地区之一，以至在元朝数十年间也没有恢复元气。

元朝末年，江淮和长江中游反元起义风起云涌，此起彼伏。安庆一带战略地位重要，是不同的起义军和元军争夺的焦点，残酷的争夺战持续多年。元至十一年（1351）八月，彭莹玉、邹普胜、徐寿辉等在湖北蕲州、黄州一带起义，次年徐寿辉就率部沿江而下，围攻安庆城，攻下周围各县，并继续东下。十一月，徐寿辉大举攻安庆城，无功而返。至正十五年，徐寿辉势力复振，攻占湖北沿江府县，安庆府又受战祸波及。次年，余阙被

据汪洋遗址出土文物考证，早在五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望江县城就有人类活动。东晋义熙元年（405）始置新阳县。隋开皇十八年（598）名望江县。宋、元、明、清时属安庆府，民国年间属安庆道、安庆专员公署，建国后属皖北行行政公署安庆专署、安庆地区、安庆行政公署、安庆市。

望江，古雷池所在地，安徽西南门户。“三山六水一分田”，曾经是望江县地貌的真实写照。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望江自有人类活动以来的几千年的历史，就是拓荒、围垦的历史。一代接着一代，勤劳的望江人民坚持向水而生，拓荒、围垦历史的文字记载可上溯到三国吴屯兵皖河兴建西圩。据1995版《望江县志》载：清代，皖河流域围垦渐多，先后建圩47口，耕地75251亩。民国时期，围垦中心转移到沿江洲区，先后建圩23口，耕地163740亩。解放初，经过整修和兼并，全县有圩口53口。1959年大兴围湖造田，从围垦大漳湖开始，至1976年大圩建成，先后建圩169口，耕地154721亩。1987年全县有圩222口，控制面积482.92平方公里，耕地357512亩，拓荒、围垦成田总面积占全县总耕地66.73%。。圩堤总长724.38公里（其中沿江堤长981.4公里，沿河湖堤长626.24公里。保护面积万亩以上的圩9口，耕地235374亩；万亩以下千亩以上的58口，耕地111502亩；千亩以下的155口，耕地10636亩。

在与水搏斗求生求生存发展过程中，望江人书写着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彰显出现独特的精神风貌。

### 围垦:时空背景的双重选择

#### 1、瓦屑坝·移民·被迫选择

翻开县城、沿江以及后山土著大姓宗谱，在卷一总系中总能找到这类字句：“某某公于明季(初)自江西饶州鄱阳瓦屑坝迁”“……先祖来自江西瓦屑坝”“……明洪武某年迁自瓦屑坝”等等。

根据《明史》《明太祖实录》及大量家谱记载和文史专家考证，洪武年间江西向湖北、安徽、湖南和江苏共移民二百一十余万人。在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安庆府的约42万人口中，大约有28万多江西移民，其中约20万来自饶州，迁自瓦屑坝的有10万人，占饶州籍移民的一半。6个世纪过去了，这10万瓦屑坝人的子孙已经植根在江淮大地，成为安庆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和上海交通大学大学教授柯基的《中国移民史》等诸多文献资料也显示：桐城、宿松、望江、潜山、怀宁等安庆市的属县中大部分人是瓦屑坝移民的后裔。

含望江县在内的安庆府移民，源自江西瓦屑坝有着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

##### （一）明初大移民

元朝统治中国仅有短短的八十九年（1279—1368年），它是在军事暴力征服宋王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